

# 論胡適在白話文運動的領導地位

蔡元唯\*

## 摘要

在陳獨秀與胡適二人之間，胡適比陳獨秀更先注意到「文學革命」這一觀念，他在 1915 年夏天和 9 月早已注意到這點。胡適寄陳獨秀信論「八事」及〈文學改良芻議〉是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之前的。胡適的「八不」主義並非一夜思慮的成果，它其實是胡適經過與他留美幾個朋友間的筆戰所形成的想法。不但如此，從當時參與文學革命的人及其反對者的談話中，我們可知胡適是文學革命的領袖。另外，胡適絕對沒有忽視文學內容的改革，只是他文學形式方面的問題談得多些。最重要的，是胡適沒有離開文學形式去高談文學內容的革命。沒有形式的改革哪有內容的改革！

在論定胡適於文學革命的貢獻方面，就算胡適所主張的改革以前都有人說過了，但胡適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把白話文提升到與古典文言文相同的地位，甚至還在文言之上。這跟在他之前的人提倡白話的目的，是「根本上的不同」，這就是胡適最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胡適、陳獨秀、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新青年、公安派、五四運動

---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壹、前言

### 一、研究動機

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認為：「如果要正確理解 19 與 20 世紀的中國歷史，必須把它看成不僅是外部勢力的產物，而且也是帝制時代最後幾個世紀的重大的內部演變的產物。」（柯文，1991：臺灣版序言頁 IV）他提出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以研究中國史，成為一種新典範。筆者在研究胡適在民初白話文運動（或稱文學革命）的歷史地位時，發覺如果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來看，白話文運動其實自清末已經開始，胡適不過是追隨這一個大趨勢，且表現良好罷了。但胡適本人卻多次強調文學革命是在「國外」開始的，是他和他幾個朋友在國外（美國）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偶然」的。胡適這種觀點筆者姑且稱之為「以外部影響（美國）為中心」的觀點，對比起「以中國內部因素為中心」的觀點，誰是誰非，正是筆者作此文的動機。

### 二、研究概況舉要<sup>1</sup>

研究胡適的學者雖然很多，但針對胡適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方面的爭議，卻不是都有做綜合的比較。如余英時就說，他對胡適是否

---

<sup>1</sup> 在筆者這篇小文章中無法詳細列舉過去至當前所有的胡適研究概況，故僅能舉其要者。欲對胡適著作出版情況、研究胡適專著及研究胡適的工具書有較詳細的了解，可見莫高義改編自其博士論文的著作中的〈緒論〉。（見莫高義，2006：緒論頁 5-13）

「名實相符」的問題沒有討論的興趣，他所關注的是胡適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余英時，2004a：178）50年代的中國大陸在舉國批胡之時，對胡適在文學革命的貢獻自然一筆抹煞。<sup>2</sup>在毛澤東指揮下，於1955年還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8巨冊。<sup>3</sup>我們不能只因為共產黨是以反對胡適這個自由主義者的動機出發，而編出這些集子，所以就小看了這些文章的價值。因為這些學者所舉出的證據、組織的邏輯都很有參考價值。<sup>4</sup>

在與中國大陸批胡同時的臺灣情況則正好相反；因為胡適的反共，上自蔣中正，下自《自由中國》雜誌，自然都把胡適舉為文學革命的第一人。但正所謂中國大陸「明批」，臺灣「暗批」，（唐德剛，1991：340）臺灣自然也存在著批判胡適的聲音；如港臺的新儒家對胡適的批判。<sup>5</sup>另外，近年來因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對胡適的態

<sup>2</sup> 對1917年文學革命起，到1950年代中國大陸舉國批胡為止，各路人馬對胡適在文學革命領導地位的看法，連戰有一概略的陳述，見Chan Lien（連戰），1965：346-364。

<sup>3</sup> 《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1~8輯）（1955）。1959年4月，曾出版八輯《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的三聯書店「為配合」五四運動四十週年，又再選編出版了一個「胡適思想批判」的「論文選集」，以應讀者「繼續研究和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需要，其中除增加孫定國、陳森玉兩篇文章外，仍是前8輯的陳貨。見胡明，1997：988-989，胡明註5；謝泳，2006：53，謝泳註24。

<sup>4</sup> 1950年代中國大陸舉國批胡時集中在兩個主題：一是力證遠在胡適發表其〈文學改良芻議〉前，已有人對白話文的推廣作出貢獻；一是即使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最多產的白話文作家總還是共產主義者，整個文學革命運動胡適只是個旁觀者。〔Chan Lien（連戰），1965：358〕

<sup>5</sup> 對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新儒家與胡適的衝突情況可見翟志成的〈文化激進主義 VS. 文化保守主義：胡適與港臺新儒家〉一文。港臺新儒家的主要人物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關於錢穆是否應劃入新儒家陣營，學界尚有爭論。（翟志成，2008：142-143）

度也慢慢有了轉變，對他客觀與正面的肯定也愈來愈多。

依筆者目前的觀察，對「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地位」有宏觀看法的唐德剛，其所著的《胡適雜憶》是一本頗有價值的著作。（唐德剛，1990）他協助胡適所做的口述歷史《胡適口述自傳》，（胡適，1986j）是瞭解胡適思想的一本入門書籍。重要的是，本書中有近百條唐德剛所加的註，往往發人所未發。周策縱著有《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一書，（Chow, 1960）對文學革命的前因後果有詳盡的敘述，加上他所寫的單篇論胡適的文章，對本研究題目都有很大的幫助。余英時對胡適在思想史上的貢獻有類似蓋棺論定的看法，他著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余英時，2004a）及〈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余英時，2004b）二文，為研究胡適必讀之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孝悌所寫的〈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這篇文章，（李孝悌，1991）他詳細討論了有關清末白話報刊的各種統計資料和其他類型的白話文。中國大陸學者沈衛威著有〈〈文學改良芻議〉的歷史考察〉，（沈衛威，1993）他詳細考證了胡適的「八不主義」的歷史根源，說明了明末「公安派」文學革新和胡適「八不」的相契合，很值得參考。

在工具書方面，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的秘書胡頌平，編有《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1990）中國大陸學者耿雲志編有《胡適年譜》，（耿雲志，1989）<sup>6</sup>同是中國大陸學者的曹伯言

<sup>6</sup> 周質平評論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書時，認為「疏於剪裁」；對耿雲志的《胡適年譜》卻許為「精審」。（耿雲志，1989：序頁2）

與季維龍也編有《胡適年譜》。(曹伯言、季維龍, 1986) 另外, 季維龍編有《胡適著譯繫年》。(季維龍, 2003)

在胡適的著作出版方面, 目前最好的版本為 2003 年 9 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 其所收胡適著作最為齊全。

### 三、近代中國文學革命及胡適出現的背景

1917 年 1 月 4 日, 蔡元培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經由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的推薦, 任用正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sup>7</sup>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 (即文學院長)。(Chow, 1960: 52) 差不多在那時, 許多新思想人物也加入了北大教授團; 如文字學家兼聲韻學家錢玄同, 語言學家兼詩人的劉復 (字半農), 詩人兼書法家沈尹默, 他們三人都是白話詩和文學革命的先驅人物。另有新散文和新詩作家周作人, 與其兄魯迅 (原名周樹人, 號豫才)。當然, 還有剛從美國回國的胡適。1918 年以後, 《新青年》開始由六個北大教授 (陳獨秀、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沈尹默) 輪流編輯。(Chow, 1960: 44, 53-54)

胡適之所以能在自美回國後, 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內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 依余英時的分析, 是因為在胡適歸國前後, 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被胡適填上了。胡適利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的態度」, 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制

<sup>7</sup> 1915 年 9 月 15 日, 陳獨秀於上海創辦《青年雜誌》, 共出了 6 期, 稱為第 1 卷 1 至 6 號。第 2 卷 1 號在 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 刊名改為《新青年》。1916 年年底, 陳獨秀至北京大學任教, 雜誌社於 1917 年正式遷到北京。見《《新青年》(《青年雜誌》)·簡介》(唐沅, 1988: 1)。

的層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層面，<sup>8</sup>因而突破了晚清以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胡適說出了其同時代人想說而不知「怎樣說才好」的問題。<sup>9</sup>

至於為何是胡適而不是別人填補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空白這個問題，我們當然可以說胡適的出現是偶然的，就算沒有胡適，遲早也會有別人出來扮演他的角色。因思想革命醞釀到了成熟時期，必然有人會乘勢而起。但胡適如果沒有在美國留學的7年中（1910～1917年）做長期的精神準備，即使有客觀的條件輔助，也不能發生功效。（余英時，2004a：189）所以余英時說：「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造成了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的巧遇。」（余英時，2004b：3）

## 貳、文學革命的催生者與領導者

### 一、催生者是胡適或陳獨秀的爭議

1913年7月，國民黨為反對袁世凱，發動了二次革命，兩個月

<sup>8</sup> 「新文化運動」（1915～1919年）時《新青年》所喊出的「文化革命」在現代中國政治與思想界帶來了兩個深遠的影響；一是全面的反中國傳統，一是相信有效的政治行動與社會經濟的進步，其前提是文化與思想上的改變。這影響了後來的毛澤東而發起了「文化大革命」。（Meisner, 1999: 295-296）

<sup>9</sup> 余英時說道：「（顧頡剛與傅斯年）他們雖有豐富的舊學知識，卻苦於找不到一個系統可以把這些知識貫穿起來，以表現其現代的意義。胡適的新觀點和新方法便恰好在這裡發揮了決定性的轉化作用。」（余英時，2004a：179-187, 207）

內失敗。鑑於反袁世凱失敗的教訓，陳獨秀有這一見解：只有在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覺醒之後，只有在舊社會和舊文明有了基本的改變之後，中國才有解脫軍閥桎梏的可能。他覺得若沒有一種新的出版物，這種解放是不可能達成的。(Chow, 1960: 44) 於是他著手辦啟蒙運動的刊物。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出版。《青年雜誌》出版6號停刊。在這一卷中，胡適並沒有投稿。1916年9月1日，《青年雜誌》復刊，改稱《新青年》。《新青年》第1號，稱為第2卷1號。

我們做個表：(內阿拉伯數字代表第某號)

表 1<sup>10</sup>

第二卷 (一 - 六 · 一 · - ~ - 一 - 七 · 二 · - )	
陳獨秀主要論文	胡適論文及信
〈新青年〉(1)、 〈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2)、 〈憲法與孔教〉(3)、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4)、 〈袁世凱復活〉(4)、 〈再論孔教問題〉(5)、 〈文學革命論〉(6)	俄 泰來夏甫作〈決鬥〉(1)、 致獨秀信論「八事」(2)、 〈藏暉室劄記〉(4~6)、 〈文學改良芻議〉(5)、 〈白話詩八首〉(6)

<sup>10</sup> 改編自鄭學稼所作的表。(鄭學稼，1999：42)

一般來說，我們都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當成是文學革命的起點，胡適也因此「暴得大名」。但很多人認為文學革命大部分是陳獨秀的功勞，胡適擔了太多虛名。如葉青（任卓宣）說胡適是「陳獨秀文學革命方面的助手」，（葉青，1999：35）而鄭學稼也咬定「胡適未曾在十年代中對思想運動吹過什麼『風』」，（鄭學稼，1999：49）中國大陸在舉國批胡時更認為胡適具有「中國資本主義特有的軟弱妥協個性」，（何其芳，1959：278）如不是陳獨秀文學革命根本不會成功。

其實由上表可知，胡適寄陳獨秀信論「八事」及〈文學改良芻議〉是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之前的。胡適的「八不」主義並非一夜思慮的成果，它其實是胡適經過與他留美幾個朋友間的筆戰所形成的想法。<sup>11</sup>胡適寄信提出「八不」登在1916年10月的《新青年》，當時他認為「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胡適，1986c：3）而此「八事」之最後決定早在該年8月19日就告訴朱經農了。（胡適，1986i：96）他在給陳獨秀信重申「八事」時曾聲明：

此八事略具要領而已。其詳細節目，非一書所能盡，當俟諸他日再為足下詳言之。（胡適，1986c：4）

陳獨秀收到這封信後，覆信給胡適說：

---

<sup>11</sup> 胡適說：「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胡適，1986b：124）



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項，<sup>12</sup>其餘六事，僕無不合十贊歎，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倘能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其業尤盛。(陳獨秀，1934b：17-18)

陳獨秀要胡適「詳其理由」，這就是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發表的背景。據胡適回憶：

……獨秀見了我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就完全贊成我的主張；他接著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二卷五號)，正式在國內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胡適，1986b：129)

葉青說：

……〈文學改良芻議〉乃陳獨秀在覆信中叫胡適他寫的。而胡適他與陳獨秀寫信提出「八不」，亦係見了陳獨秀說「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云云而然。<sup>13</sup>所以文學革命底倡始者仍是陳獨秀。(葉青，1999：26)

<sup>12</sup> 第五項「須講求文法之結構」，陳獨秀說他不明「將何所指」；第八項「須言之有物」，陳獨秀說他「僕不甚解」，他說：「以上兩事，尚望足下有以教之。」(陳獨秀，1934b：18-19)

<sup>13</sup> 郭廷以也說胡適據陳獨秀此言加以發揮而寫成〈文學改良芻議〉。(郭廷以，1994：575)依筆者的看法，胡適在寄陳獨秀論「八事」的信中確實提到陳獨秀這句話，但胡適也不過評論說：「此言是也」。(胡適，1986c：1)因此，把胡適所提出的「八不」歸於受陳獨秀影響似乎過於牽強。

周策縱對此的看法是：

在陳胡二人之間，胡適卻比陳獨秀更先注意到「文學革命」這一觀念，他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和九月早已注意到這點，<sup>14</sup>一九一六年十月他發表在《新青年》月刊上給陳的信裡又說到過，<sup>15</sup>只是到一九一七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時，才改做「改良」。<sup>16</sup>……後來有許多人只注意到陳獨秀在《新青年》一九一七年二月號發表的〈論文學革命〉一文，便以為「文學革命」最先或最主要是由陳所提倡，這卻不完全正確。（周策縱，1991：320）<sup>17</sup>

我們也可以從下表中看出這種情形。在《青年雜誌》第1卷前6號中陳獨秀的文章：

---

<sup>14</sup> 在國外提出「文學革命」一語最早的，乃是胡適在1915年9月17日所作的〈送梅觀莊往哈佛大學詩〉，其中有幾句是：「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見胡適，1986h：196；也可見胡適，1986b：102。

<sup>15</sup> 見胡適，1986c：3。

<sup>16</sup> 胡適後來回憶說：「……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胡適，1986b：129）

<sup>17</sup> 陳獨秀在《新青年》1917年2月號發表的文章為〈文學革命論〉，周策縱筆誤為〈論文學革命〉。

表 2

	第 1 號	第 2 號	第 3 號	第 4 號	第 5 號	第 6 號	小計
論文等篇數	13	14	15	17	15	17	91
大事記通訊等篇數	6	7	8	8	9	7	45

總計：136 篇；總評：沒有一篇白話文。

資料來源：李敖，1999：64-65。

「雖然陳獨秀早年也曾有編輯白話報刊的經歷，<sup>18</sup>但在創辦《新青年》之初卻還沒有意識到採用白話文這一語言工具的潛在意義，例如，《新青年》前幾卷的文章均為文言文」。(朱文華，1994：463)不過，文學革命如果沒有陳獨秀似乎也不能成功。在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後，陳獨秀在《新青年》第 2 卷 6 號發表他的〈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適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為之前驅！（陳獨秀，1934a：136, 140）

<sup>18</sup> 陳萬雄曾統計民國前國人所編刊的白話報，作有一表，按該表陳獨秀曾主持的白話報有《蕪湖白話報》（創刊時間不詳，但不晚於 1904 年 1 月）及《安徽俗話報》（1904 年 1 月創刊出版）。（陳萬雄，1982：39-40）另外，胡適在 16 歲時即替白話報《競業旬報》（1906 年 10 月 11 日創刊）寫稿及編輯。周明之於評論胡適《競業旬報》這段時期說道：「現在人們都知道，胡適並不是白話運動的發動者。……很明顯，青少年時代的胡適運用白話文是追隨了一個強大的趨勢。」見胡適，1986a：64-73；Chou, 1984: 11。

陳獨秀不惜冒著與所有保守派為公敵的勇氣，使在美國的胡適寫了封信給陳獨秀說道：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適，1986c：29）

陳獨秀在答覆胡適這封信時說道：

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1934b：89-90）

後來胡適自己也承認：

胡適他認為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胡適，1986g：139-140）

## 二、胡適為文學革命的領袖

首倡這次偉大文學革命的是誰？有的說是陳獨秀，有的說是胡適，有的說是魯迅、劉半農、錢玄同。其實，發揮最重要作用的是胡適。在當年中國大陸批判胡適時都不承認這一點，不時地提出如下看法：「披著『學者』外衣的政治陰謀家胡適，一直卑劣無恥地自吹自捧，把自己說成是文學革命運動的『倡導者』。」（劉綏松，1955：300）我們只好拿出當時許多文學革命倡導者對胡適的推崇或印象來說明這個事實。如陳獨秀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陳獨秀，1934a：136）<sup>19</sup>

錢玄同說：

文學革命之盛業，得賢者〔筆者按：指胡適〕首舉義旗，而陳獨秀、劉半農兩先生同時響應，……（錢玄同，1986：46）

劉半農說：

文學改良之議，既由胡君適之提倡之於前，復由陳君獨秀錢君玄同贊成之於後。（劉半農，1917：1）

---

<sup>19</sup> 不過在這裡我們也要公平的說，胡適也稱陳獨秀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胡適，1986g：138）

新潮社的傅斯年則說：

中國文學之革新，醞釀已十餘年。去冬胡適之先生草具其旨，揭於《新青年》，而陳獨秀先生和之。時會所演，從風者多矣。（傅斯年，1918：62）

魯迅後來也說：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sup>20</sup>是不容易的，……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魯迅，1981：13。）<sup>21</sup>

另外，從文學革命反對者的攻擊中，也可觀察胡適於其中的地位。《新青年》一開始提倡文學革命，就遭到反對派的攻擊。胡適是他們攻擊的主要對象之一。最先，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小說《荊生》和《妖夢》，用一些假名字來影射攻擊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和錢玄同。<sup>22</sup>稍後，學衡派的胡先驌寫兩萬餘言的長篇論文〈評《嘗試集》〉，指責胡適的詩「魯莽滅

---

<sup>20</sup> 所謂「無聲的中國」魯迅解釋道：「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只是只等於零的。」（魯迅，1981：12）

<sup>21</sup> 不過要注意的是，魯迅在這裡所說的胡適提倡「文學革命」，是指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上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見編者註7（魯迅，1981：16）

<sup>22</sup> 關於這兩部小說所影射的內容大意可見 Chow, 1960: 66-68。

裂，趨於極端」，因而「必死必朽」。<sup>23</sup>甲寅派的章士釗攻擊新文化運動的文章，如〈評新文化運動〉與〈評新文學運動〉，也都指明攻擊胡適。（章士釗，1990a：195-201；章士釗，1990b：221-225。）

「復古主義者們不約而同地都認胡適為仇讎，不也從反面證明了胡適在文學革命中所處的地位和他所發揮的革命作用嗎？」（易竹賢，1993：39）

### 參、胡適對文學「形式」與「內容」的主張

有一種意見認為，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只是強調「形式」的變革（意指以白話代文言，即「形式主義」）而不求思想「內容」的革新。早年中共固然是這麼認為，因為「做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工具的胡適，……他是那樣害怕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的內容！」（林淡秋，1955：242-243）「撇開文學內容，隱蔽文學的階級性，把問題局限在文學的工具上，這本是胡適一貫的伎倆。」（余冠英，

<sup>23</sup> 胡先驕抨擊胡適所主張的「過去之文字為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文字為活文字」的看法。胡先驕認為，中國的古文與白話的關係不等於希臘文、拉丁文與英、德、義大利文的關係。（胡適認為相等）希臘文、拉丁文對於英、德、法國來說，其實是外國文。喬賽（Chaucer）、但丁（Dante）、路德（Luther）時的英、義、德文與今日的英、義、德文的關係，才是等於中國周秦古文與白話的關係。胡先驕又認為，文學的死活以其自身價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的文字的古今為死活。所以，胡適作詩雖用其所謂「活文字」的白話，還是「死文學」。因為，「胡適君但能作白話而不能作詩」，其詩「僅為白話而非白話詩」。（胡先驕，1922：17-19、23）。

1959：286）這種看法甚為普遍，不勝枚舉。<sup>24</sup>這種看法當然並非沒有證據，例如胡適說：

……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胡適，1986d：180-181）

他也說過：

從一九一六年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學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胡適，1986b：106）

---

<sup>24</sup> 如郭廷以說：「對於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建議，陳獨秀他大體贊同，不過胡適所說的限於文學形式的改良，陳獨秀進而主張文學內容的革命，使與思想解放融為一體。」（郭廷以，1994：575）鄭學稼說：「……白話文學運動，胡適只注重它的形式，究竟需要何種文學，應打倒何種文學，只有陳獨秀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中有明確的說明。對比陳氏的〈文學革命論〉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就可明白後者對於白話文運動之歷史任務，還是很模糊的。」（鄭學稼，1999：48）葉青則認為，陳獨秀是文學革命「思想」上的領導者，他的〈文學革命論〉闡明文學革命的「理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只屬於文學革命的「技術」。（葉青，1999：26）



又說：

我們這一班主張文學革命的人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胡適，1986e：220-221)

但是，「若只徵引胡適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說的話，而不拿他在別處說的話來平衡，那是可誤導人的。」(周策縱，1999：序頁 13-14)<sup>25</sup>其實，早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前，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就認為當時文學墮落的總因在於「文勝質」。胡適說：「文勝質者，有形式而無精神，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質，軀殼內之精神。」(胡適，1986c：3)信中接著又說：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sup>25</sup> 周策縱說這句話時，雖是在力辯胡適絕非「反整個傳統」的學者，但在本文這個地方似乎也適宜。

七曰，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胡適，1986c：3-4)

這都表示胡適並沒有忽視文學「內容」的改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胡適指出，舊文學的小說材料，總不離「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絕不夠新文學的採用，因此必須「推廣材料的區域」，擴大描寫的對象和範圍，把「今日的貧民社會」，工農商界的「一切痛苦情形」，以及「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作為新文學的材料。(胡適，1986f：68)「這樣，就給新文學開拓了一個為舊文學所不可比擬的十分廣闊的描寫領域，給新文學提供了舊文學所不曾有過的嶄新的社會內容。怎麼能說胡適的主張是完全不顧文學內容變革的形式主義呢？」(易竹賢，1993：44)<sup>26</sup>

胡適也曾為文力辯他兼顧到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他說：

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獨秀提出的「三大主義」，都顧到形式和內容的兩方面。我提到「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不作無病之呻吟」，都是文學內容的問題。獨秀提出的三大主義——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也不曾把內容和形

<sup>26</sup> 不過夏志清批評道：「這張胡適給新文學作家建議的寫作主題的清單，顯示了胡適把文學當作社會批評的工具的狹窄文學觀。」(Hsia, 1999: 9)

式分開。錢玄同先生響應我們的第一封信也不曾把這兩方面分開。但我們在國外討論的結果，早已使我們認清這回作戰的單純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用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工具。……（胡適，1998：124）

所以文學革命的作戰方略，簡單說來，只有「用白話作文作詩」一條是最基本的。這一條中心理論，有兩個方面：一面要推倒舊文學，一面要建立白話為一切文學的工具。……（胡適，1998：125）

所以我回國之後，決心把一切枝葉的主張全拋開，只認定這一個中心的文學工具革命論是我們作戰的「四十二生的大炮」。（胡適，1998：128）

平心而論，胡適的確對文學的形式強調得多些，但他解釋道：

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裏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胡適，1986e：221）

胡適還進而解釋說：

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胡適，1986d：181)

最後胡適乾脆說：

……我們開始也曾顧到文學的內容的改革。例如玄同先生和我討論中國小說的長信，就是文學內容革新的討論。但當那個時期，我們還沒有法子談到新文學應該有怎樣的內容。……在那個貧乏的時期，我們實在不配談文學內容的革新，因為文學內容是不能懸空談的，懸空談了也決不會發生有力的影響。(胡適，1998：135)

「胡適對於五四文學革命的最重要、最關鍵的貢獻恰恰在於他沒有離開形式去高談內容的革命，而是把形式的變革和內容的革新緊密聯繫起來。」(曠新年，1999：313)「當年，如果離開以白話取代言言這個形式方面的變革而徒事高談文學革命，那就一定只能陷於空談，不可能取得開一代文風的偉大成功。」(易竹賢，1993：44)胡適後來於1935年發表的文章中說：「至今還有一班人信口批評當日的文學革命運動，嘲笑它只是一種『文學形式』的改革。對於這班人的批評，我在16年前早已給他們留下答覆了」。(胡適，

1998：133）胡適引用其於 1919 年時所說的話來答覆：

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說：「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甚至於南社的柳亞子也要高談文學革命。但是他們的文學革命論祇提出一種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畫。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形式上的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的問題。等到人問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大道」是什麼，他們可回答不出了。（胡適，1986e：220）

## 肆、胡適對文學革命的貢獻

唐德剛在其書《胡適雜憶》中提到一件事：

胡老師是有高度國際聲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場」也就遠及海外。五十年代初期，美國頗具影響力的《展望雜誌》（*Look Magazine*）推舉出一百位當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偉人，「胡適」大名亦榮列其中，為百人幫之一。但是這批推舉者顯然但知「胡適」其人，而不知「胡適」其事。因而他們推舉的理由——「發明簡體話文」——連胡適也不能接受！

「世界上哪有什麼人能『發明』一種文字呢？」胡先生笑著向我解釋。

「倉頡！」我說。胡先生為之大笑。（唐德剛，1990：253）

在當年中國大陸全國清算胡適時，無人不說胡適冒功，也都「證據確鑿」，直到最近還有人在「考據」。(李玉，1996)因為從晚清起就有人提倡白話文了，所以胡適的「文學革命」也就沒有太大的價值意義。事實上，胡適之前早已有人提倡白話並不是中共舉國批胡時的創新說法，胡適本人就多次提到清末白話文的發展。(胡適，1998：111-119；胡適，1986g：135-136)

說胡適冒功的人的證據之一，是認為胡適的理論抄襲自晚明的公安派。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源流」，並將講演整理成書出版。他認為「五四」文學革命運動和明末文學革新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精神是相同的，「胡適之的『八不主義』，也即是復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sup>27</sup>的主張。只不過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遂使兩次運動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則仍無多大差異處」。(周作人，2002：53)<sup>28</sup>周策縱也說：「胡適致陳獨秀信中

<sup>27</sup> 公安派的領袖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年），是不重寫作技巧的。剪裁，在他看來，是某種程度的「失真」。因此，他強調「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周質平，2002：184)

<sup>28</sup> 同樣的看法出現於周作人同書，頁26-27、46-47、54。但依周質平的看法，胡適並沒有直接受明末公安派的影響，他們的相似處只能說「不謀而合」。周質平又反駁周作人所說這兩次文學運動在「根本方向是相同的」的說法，認為公安派與胡適有兩點不同：第一，公安派所領導的文學運動絕不是一個白話文運動。晚明的公安派是想借口語的活力來延續文言的生命，而不是取代言言；而白話文運動則是徹底地以白話取代言言。第二，胡適早年留美時較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回國後則漸漸趨向於文學的表現技巧。但不管如何，都與公安派所強調的「性靈」不同。周質平的結論認為，「語文合流」是明末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胡適與公安派相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共同的認知，即「文字必須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應當時的口語」。(周質平，2002：177-185)

和《芻議》文中所提到而後來改稱作『八不主義』的，『須言之有物』，『不用濫調套語』，『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不講對仗』，『不用典』等，都是前人已主張過的。不過胡適他在當時一併提出，當然不無救藥時弊的功用。」（周策縱，1991：321）

證據之二，是「清末維新改良派的文學革新」。其聲勢和內容較晚明的文學革新為大，主要有三個方面：詩界革命、散文解放、小說、戲曲的改革與提倡。<sup>29</sup>如裘廷梁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竟把中國不富強的原因歸結為「文言之害」，進而認為使用白話文「為維新之本」。（裘廷梁，1980：168）又在「詩界革命」有卓越成就的黃遵憲，主張「我手寫我口」，（黃遵憲，1980：131）提倡以通俗語言入詩，反對崇古卑今和盲目模仿。<sup>30</sup>

證據之三，就是清末白話報刊的盛行。晚清以來，以白話或俗話所辦的報刊，在全國各地已陸續出現。據統計，自1876年，上海出版《民報》日刊，為最早發行的白話報。下至1911年，全國各地有資料可徵的白話報共達68種之多，其分布地點遍及上海、北京、無錫、杭州、蕪湖、濟南、九江、保定、武漢、安慶等大小都市。（陳萬雄，1982：38-45）除了白話報紙外，另有其他類型的白話，

<sup>29</sup> 詳細經過可見胡適，1986g：87-104。評其得失見沈衛威，1993：289。

<sup>30</sup> 耿雲志認為，說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不是胡適而是「清末的黃遵憲或其他什麼人」是「不合事實」的。他列出下列五個原因駁斥：第一，無論是黃遵憲或其他什麼人，他們只不過是感覺到白話有可取之處，有用白話作文做詩的願望；第二，他們誰也不曾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歷史上作過系統的研究；第三，他們沒有提出以白話代替文言的具體意見；第四，他們自己也不曾下決心脫棄古文完全改用白話；第五，他們更沒有在社會上掀起一個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運動。（耿雲志，2007：38）

如各級政府的文告、宣傳，或是私人寫的宣傳或告誡性的文字。  
(李孝悌，1991：13)所以，清末最後10年是中國近代白話運動史真正的開端。(李孝悌，1991：19)<sup>31</sup>

從以上這些論述，我們或可以看出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傳承、延續關係，但這並不是說五四文學革命在「根本方向」上與以前相同；事實上五四文學革命運動跟以往的差異就恰恰在「根本方向」上。<sup>32</sup>胡適在檢討半世紀間中國文學的發展流變時說：

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胡適，1986g：135-136)<sup>33</sup>

<sup>31</sup> 李孝悌認為，五四的白話文運動絕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異物，而是清末發展的延伸和強化。最直接的證據，即領導1910年代白話文運動的兩個最重要的人物胡適和陳獨秀，都在1900年代的主要白話刊物上寫過大量的文字，而且其中的一些主張都成為1910年代啟蒙運動中心思想的要素。(李孝悌，1991：19-24)

<sup>32</sup> 李孝悌強調，五四白話和清末白話雖有明晰可察的傳承、延續關係，卻並不表示這兩個時期的白話運動是相同的東西。而胡適正是造成兩者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李孝悌，1991：24)

<sup>33</sup> 余英時根據胡適這段文字，認為胡適16歲時(1906年)在《競業旬報》上所發表的許多「破除迷信，開通民智」的白話文字大概也都是寫給「他們」看的。但胡適在美國受了7年的民主洗禮之後，至少在理智的層面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心理。(余英時，2004a：200)



清末白話是以下等人為主要對象，目的在為他們「說法」、「開智」，所以推廣白話文只是為了政治與教育上的需要而已。清末的社會改革者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從未想到要涉及到文學的範圍去，<sup>34</sup>而白話小說的作者，也從不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中國的正統文學。所以，胡適在白話文運動的貢獻在於，他是第一個肯定白話文的尊嚴與其文學價值的人。(Hsia, 1999: 7) 胡適把清末已經蓬勃發展的白話文重新定位，將它的對象從下等社會或中下等社會，擴及到社會每個層面。(李孝悌，1991：27) 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胡適，1986g：136)

陳獨秀在解釋文學革命發生的背景時說：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灰滅……(陳獨秀，1986：33-34)

<sup>34</sup> 胡適認為，「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胡適，1986g：136) 李孝悌認為胡適之所以提倡白話文學，是因為胡適雖了解到清末白話的載道功能，但也知道若不對文字本身加以精鍊，讓它足以用來創造文學作品，是無法取得上層社會認同的。(李孝悌，1991：26)

這是「唯物史觀」哲學家用「經濟」來解釋歷史的。胡適拒不接受這種視經濟為「最後之因」的「單因」(monistic cause)觀點，(胡適，1986j：144)他詳細闡述了許多其他原因，諸如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原因以及國際因素等。(胡適，1998：121-124)他又說：

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裡，很忠實的記載了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怎樣「偶然」在國外發難的歷史。……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來記載一個思想產生的歷史。這個思想不是「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產生出來的，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胡適，1998：121, 123)<sup>35</sup>

胡適的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因為胡適思想個性有一種「一視同仁」的激進傾向，即使有客觀因素的助力，白話文運動也不會在五四時期取得那麼重大的成就。(李孝悌，1991：28)

<sup>35</sup> 唐德剛認為，胡適一生都堅持一個論調：「白話文運動」雖然只是他們少數朋友之間由辯論而發生的「偶然事件」，但因為他是個「實驗主義者」，而把這運動的正確發展的方向給「實驗」出來了。因而沒有「胡適」，恐怕也就沒有「白話文運動」——至少運動也不會在那時就發生了。(胡適，1986j：161)關於胡適認為「白話文運動」中人為「有意的主張」的重要性，而不是光等待自然的演變，見 Yang, 1993: 186-188。

## 伍、結論

在陳獨秀與胡適二人之間，胡適比陳獨秀更先注意到「文學革命」這一觀念，他在 1915 年夏天和 9 月早已注意到這點。胡適寄陳獨秀信論「八事」及〈文學改良芻議〉是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之前的。胡適的「八不」主義並非一夜思慮的成果，它其實是胡適經過與他留美幾個朋友間的筆戰所形成的想法。不但如此，從當時參與文學革命的人及其反對者的談話中，我們可知胡適是文學革命的領袖。另外，胡適絕對沒有忽視文學內容的改革，只是他文學形式方面的問題談得多些。最重要的，是胡適沒有離開文學形式去高談文學內容的革命。沒有形式的改革哪有內容的改革！

在論定胡適於文學革命的貢獻方面，就算胡適所主張的改革以前都有人說過了，但胡適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把白話文提昇到與古典文言文相同的地位，甚至還在文言之上。這跟在他之前的人提倡白話的目的，是「根本上的不同」，這就是胡適最重要的貢獻。

## 參考書目

### 壹、胡適本人著作

- 胡適，《四十自述》，《胡適作品集》冊 1（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a）。
- ，〈逼上梁山〉，《四十自述》，《胡適作品集》冊 1（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b）。
- ，〈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作品集》冊 3（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c）。
- ，〈談新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作品集》冊 3（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d）。
- ，〈《嘗試集》自序〉，《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作品集》冊 3（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e）。
-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作品集》冊 3（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f）。
-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作品集》冊 8（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g）。
- ，〈送梅觀莊往哈佛大學詩〉，《胡適留學日記（三）》，《胡適作品集》冊 36（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h）。
- ，〈文學革命八條件〉，《胡適留學日記（四）》，《胡適作品集》冊 37（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i）。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冊 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j）。

## 貳、有關胡適之研究

### 一、工具書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0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11）。

唐沅等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09）。

耿雲志編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季維龍編，《胡適著譯繫年》（一）（二），《胡適全集》冊 43、4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09）。

### 二、專著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臺北：稻香出版社，1991.08）。

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長沙：岳麓書社，1999.08）。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自編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01）。

胡明，《胡適傳論》下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 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11）。
- 莫高義，《書生大使——胡適出使美國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05）。
- 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下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05）。
-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1879年～191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 陳獨秀，《獨秀文存》卷3（上海：亞東圖書館，1934b）。
- Chow, Tse-tsung (周策縱).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hou, Min-chih (周明之).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 Hsia, C. T. (夏志清)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th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eisner, Maurice J.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 三、論述

- 朱文華，〈胡適「文學革命」論的文化意義〉，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中央研究院，2004a）。
- 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中央研究院，2004b）。

- 余冠英，〈胡適對中國文學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響〉，《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04）。
- 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收入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05）。
- 李敖，〈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文星》53期（1962.03），收入李敖：《胡適研究》，《李敖大全集》冊4（榮泉文化公司，1999）。
- 李玉，〈胡適並非文學革命的首倡者〉，《安徽史學》2期（1996）。
- 沈衛威，〈〈文學改良芻議〉的歷史考察〉，收入耿雲志等：《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北京：三聯書店，1993）。
- 何其芳，〈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論文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04）。
- 周策縱，〈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收入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05）。
- 周質平，〈胡適文學理論探源〉，《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09）。
- 林淡秋，〈胡適的文學觀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輯2（北京：三聯書店，1955）。
- 易竹賢，〈「五四」文學革命中的胡適〉，《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04）。
- 胡先驕，〈評《嘗試集》〉，《學衡》1期（1922.01）。
- 唐德剛，〈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收入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05）。
- 耿雲志，〈論胡適在文學革命運動中的作用〉，《胡適研究論稿》（北

-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05)。
- 陳獨秀，〈答適之〉，收入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作品集》冊8（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06）。
-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獨秀文存》卷1（上海：亞東圖書館，1934a）。
- 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鄭振鐸編選，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二）·文學論爭集》（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a）。
- 章士釗，〈評新文學運動〉，鄭振鐸編選，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二）·文學論爭集》（臺北：業強出版社，1990b）。
- 傅斯年，〈文學革新申議〉，《新青年》4卷1號（1918.01）。
- 葉青，〈誰是新文化底播種者〉，《政治評論》7卷10期（1962.01），收入李敖：《胡適研究》，《李敖大全集》冊4（榮泉文化公司，1999）。
- 黃遵憲，〈雜感〉詩，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
-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
- 翟志成，〈文化激進主義 VS.文化保守主義：胡適與港臺新儒家〉，《新亞學報》26卷（2008.01）。
- 鄭學稼，〈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文星》52期（1962.02），收入李敖：《胡適研究》，《李敖大全集》冊4（榮泉文化公司，1999）。
- 魯迅，〈無聲的中國〉，《三閒集》，《魯迅全集》卷4（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劉綬松，〈批判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思想〉，



- 《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輯 2（北京：三聯書店，1955）。
-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3 卷 3 號（1917.05）。
- 錢玄同，〈錢先生原書〉，收入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作品集》冊 3（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06）。
- 謝泳，〈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開放時代》6 期（2006.06）。
- 曠新年，〈胡適與文學革命〉，耿雲志編：《胡適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Lien, Chan (連戰). "The Criticism of Hu Shih's Thought in Communist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5.
- Yang, Chen-te (楊貞德). "Hu Shih, Pragmatism,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3.